



“感情”和“理性”之间： 吕思勉的民族主义论

王应宪

摘要: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,也是影响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主要因素。新史学家吕思勉承袭了中外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,从中国历史情境中理解民族问题,探寻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及其演变脉络。他从“西来说”转向“中国本部论”认识汉民族起源,以文化为民族的根柢分析中华民族的特征,运用“同化论”、“外力压迫论”阐述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。在民族的“感情”和历史的“理性”之间,吕思勉本诸“史事之真”立论民族历史和民族主义,从而追求“真正的历史”。

关键词:吕思勉;民族;民族主义;真正的历史

DOI: 10.13734/j.cnki.1000-5315.2023.0709

收稿日期:2023-02-16

基金项目: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中国近代大学史学系的形成与嬗变”(22BZS114)的阶段性成果。

作者简介:王应宪,男,安徽滁州人,历史学博士,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,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,

E-mail: yxwang@history.ecnu.edu.cn。

20 世纪初以来中外学术交流日渐频繁,五四启蒙思潮之后,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蜂拥而至,民族主义伴随西学大潮涌入国门,并和中国本土的民族意识相互激荡,转化成为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思想资源。这一从西方舶来的社会政治理论,也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历史学者的认知和创作的变化。从民族主义视角讨论近现代的史家与史学,成为近些年学术界的新取向,涌现出比较丰硕的成果。作为“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”之一的吕思勉,在其等身著述中对于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多有关切,考察其民族思想以及民族主义理论的来源、观点以及中国民族主义演变的认识,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吕思勉的学术精神及其价值。

一 民族主义理论的来源

吕思勉的学术以专精而博学为特色,在传统旧学多个领域见识精湛,而且博采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,汲取社会学、人类学等新学说检讨中国的历史文化,“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基础上治史”^①。顾颉刚点评吕著通史,就称其从社会科学立场解释中国文化制度,“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”^②。就吕思勉民族主义理论来源而言,既承袭了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,对英国学者约瑟·伯尔拿《民族论》的观点也多有取鉴。

在中国历史上,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延绵已久,植根于儒家经典《春秋》、三礼的“华夷之辨”,已然蕴含着鲜明的民族意识。章太炎就曾指出:民族主义是先民遗存,其根性在太古时代就已潜在,只是到了今日乃始发达^③。新史家梁启超致力“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”,为国人引入了近代民族主义观念。1902 年,他发表的《新民说》,定义“民族主义”为具有共同民族、言语、宗教、习俗之人集成的共同体,寻求独立自主、组织完备的

① 吕翼仁《回忆我的父亲吕思勉先生》,《历史教学问题》1998 年第 2 期,第 44 页。

② 顾颉刚《当代中国史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,第 85 页。

③ 章太炎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,《章太炎政论选集》上册,中华书局 1977 年版,第 194 页。

政府，“谋公益而御他族”^①；并且称今日世界是“民族主义之世界”，一国以其固有特性而立足于天地之间，“感之于地理，受之于历史，胎之于思想，播之于风俗”^②，欧洲的发达和世界的进步均因民族主义所冲激磅礴而成。为了适应清季民初的社会革命，抵抗外部帝国主义，梁启超主张养成中国所固有的民族主义，建设民族主义国家，以挽救危亡时局。在“史界革命”中，梁启超更是揭发了民族因素之于历史研究的特别价值，主张“民族为历史之主脑”，历史的性质和精神，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“盛衰兴亡之迹”以及“所以盛衰兴亡之故”^③。在批判旧史学的弊病恶果后，梁氏提倡在国史创作中借助民族主义养成“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”的国家思想，从而消除旧史学知朝廷、不知国家的弊端，写成供给现代国人资鉴的“理想的中国史”。所谓“适合于现代中国人所需要之中国史”，指的是以中华民族原住民混合醇化、政治组织分治合治及中外交流为重要项目，说明中国民族的发展轨迹、各民族关系、民族文化以及在人类全体上的位置及其特性^④。作为梁启超思想的追随者，吕思勉对梁氏学术政论颇为推崇，自述“粗知问学，实由梁先生牖之，虽亲炙之师友不逮”^⑤，其通史、断代史及专史论著更是实践了新史学思想，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，关注于民族、民族史问题，从中国历史进程探寻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及其演变脉络。

就域外资源而言，英国学者约瑟·伯尔拿的民族理论对吕思勉的影响最为直接。1930年，上海民智书局推出伯尔拿《民族论》的刘君木译本，是书系统分析了民族的概念、因素、起源发展，以及民族与国家和大同主义、国际主义关系等问题。吕思勉称其“理论颇为正确”，“读之亦极有益”，并推介为研究民族问题的“首读”参考书^⑥。在1940年代撰写的《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》一文中，吕思勉又转述了《民族论》第二十三章《民族主义、爱国主义与战争》中的“过去的冲突纷争，不是民族主义之过，而是不奉行民族主义之过”语句^⑦，言称“论民族主义的人说得好：‘民族斗争之所以剧烈；非民族主义之过，乃遏抑民族主义之过’”^⑧。伯尔拿“外力逼迫之为民族的因素”说，更成为吕思勉以“外力压迫”解释中国民族主义演变的理论依据。

二 从“西来说”到“中国本部论”

讨论民族主义的发生，自然绕不开民族起源问题，而这一议题在近代知识界却众说纷纭。如同梁启超1905年《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》一文所说，炎黄遗胄“果为中国原始之住民，抑由他方移植而来，若由移植，其最初祖国在何地，此事至今未有定论”^⑨。然而综合各方意见，可以概括为“外来”和“本部”两说，又以蒋智由、刘师培、丁谦等所附议的法人拉克波里源出巴比伦的“西来说”最占优势，也为一般讲述中华历史文明者“奉为圭臬”^⑩。对于汉族是由他处迁来，还是发端于中国本部，吕思勉有着长期的关注和思考。其1920年代撰写的《白话本国史》倾向于“外来说”，将于阗河上源的昆仑、阿母河流域的大夏看成汉族居住地，认为汉族“似”居住在葱岭帕米尔高原一带，进入中国所走路线“大概”是新疆到甘肃，言称：“‘汉族西来’，现在虽没有充分的证据，然而蛛丝马迹是很多的。将来古书读得更精，古物发现得更多，再借他国的历史参考，一定可以大为明白。”^⑪值得一说的是，吕思勉这一时期虽然偏向“西来说”，但言辞中“似”、“大概”等不确定表述，却也显现出历史学者立论的审慎态度。

到了1930年代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，加之考古学新发现，吕思勉对汉族起源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，由“西来说”转向“中国本部论”。1934年，为中等程度学生编纂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讲义，吕思勉考证了《山海经》、《穆天子传》的成书时代以及后人掺入作伪的事实，提出中国民族的“西来说”“绝不足信”，至于从南方马

① 梁启超《新民说》，《饮冰室合集：文集之四》，中华书局1989年版，第4页。

② 梁启超《论教育当定宗旨》，《饮冰室合集：文集之十》，第60页。

③ 梁启超《新史学》，《饮冰室合集：文集之九》，第12页。

④ 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6—9页。

⑤ 吕思勉《辩梁任公〈阴阳五行说之来历〉》，《论学丛稿（上）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1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330页。

⑥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，第290页。

⑦ 约瑟·伯尔拿《民族论》，刘君木译，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，第113页。

⑧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》，《论学丛稿（下）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2册，第688页。

⑨ 梁启超《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》，《饮冰室合集：专集之四十一》，第10页。

⑩ 缪凤林《中国民族西来辨》，《学衡》1925年第37期，第2页。

⑪ 吕思勉《白话本国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册，第7—8页。

来、印度等处迁徙而来的说法“更无证据”，并且根据可靠典籍的古史事迹，结合考古发掘的成果，以为“中国民族，居于中国土地之上，为时已极悠久”^①。同一时期的修订版《中国民族史》，吕氏讲明其认识转变的原因：“予昔亦主汉族西来之说。所立证据，为《周官》郑注。谓古代之祀地祇，有昆仑之神与神州之神之别。入神州后仍祀昆仑，则昆仑为汉族故土可知。自谓所据确为雅言。迄今思之，郑氏此注，原本纬候。纬候之作，伪起哀、平，亦在西域地理既明之后。虽多取材故记，未必不附以新知。则其所言，亦与《山海经》、《穆天子传》等耳。据此议彼，未免五十步之笑百步也。”他参照神话传说、地理环境等因素考察民族的起源后指出，汉族是最初组织中国国家的民族，“语言、习俗、文化等，皆自成一体，一线相承。凡世所称为中国民族者，皆以其能用此种语言，具有此等习俗、文化而言之也。此族初居黄河流域，渐向长江、粤江两流域发展”^②。

在现代新史学眼光下，1940年代的吕著通史变换了历史叙事的取径，试图从“文化的项目”和“依据时代”两方面讲述民族国家数千年的盛衰和社会状况。吕思勉主张从茫昧古史中“追求民族的起原，实当求之于考古学，而不当求之于历史”；在谈及中国民族的由来问题时，他检讨此前“中国民族自西方高地而来”的西来之说，“根据实在很薄弱”^③；又依据河南仰韶以及辽宁、山东、浙江等地的考古新发现，论述中国的早期文化可以分黑陶、彩陶为代表的东西两系，中国民族自古介于南北两个民族间，而且是东方文化的主干。到了新中国初期，吕思勉依然呼吁研究者充分发掘并运用最古的史料，“摧陷廓清”受西洋史学家影响而发生的中国民族西来之说的误解和偏见^④。

三 文化——民族的根柢

在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中，吕思勉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民族史的基本理论，尤其是点明了文化之于民族的意义。在他看来，民族是以种族、语言、风俗、宗教、文学、国土、历史诸要素作为客观条件，在此基础上发生“共同的文化”，进一步产生民族意识，最终形成了相互团结的集团。其中，文化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核心特质。民族源于文化而发生，“一民族，就是代表一种文化的。文化的差异不消灭，民族的差异，也终不能消灭”^⑤。文化是关乎国家、民族形成发展的一大关节，“国家、民族之盛衰兴替，文化其本也，政事、兵力抑末矣”^⑥。一言以蔽之，如其通史著述所言——“民族的根柢，则为文化”^⑦。

文化是民族的根柢，这一理念贯穿于吕思勉的历史著述。吕著通史从社会经济制度、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方面讲述国史，围绕婚姻、族制、政体、阶级、财产、官制、选举、赋税、兵制、刑法、实业、货币、衣食、住行、教育、语文、学术、宗教十八类展开，分篇叙述中国历史上各种文化现象。晚年任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，吕思勉打算撰写一部中国通史，并《拟编中国通史说略》，依照社会发展情势讲述国史大势，仍将民族作为中国历史发生的首要问题，包括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分布地域和进化程度^⑧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上述通史实践及构想完全是以民族为中心的文化史。下面一段吕著通史“绪论”中的文字，颇能代表作者对于从部族走向国家、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认识：

（我国）自古代林立的部族，进而为较大的国家；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；再进而臻于统一；更进而与域外交通，开疆拓土，同化异民族……今者世界大通，前此各别的文化，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，更是毫无疑问的了。然则一提起文化，就该是世界的文化，而世界各国的历史，亦将可融合为一。^⑨

对于“民族国家”问题，吕思勉认为，当今世界并没有真正单纯的民族国家，由最初民族发生追溯国家历史的发生，可以发现一个确定不移的道理，即“一个国家建立之初总是以一个民族为主体，然后渐次吸收其余诸民族”；中国并非单纯的民族，而是融合诸多小民族而成的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国家，在汉族之外，又有以居

①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，第224—226页。

②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，第13—14、8页。

③ 吕思勉《吕著中国通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2册，第245—246、244页。

④ 吕思勉《中国通史提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，第386页。

⑤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，第215、219页。

⑥ 吕思勉《〈中韩文化〉叙》，《论学丛稿（下）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2册，第950页。

⑦ 吕思勉《吕著中国通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2册，第244页。

⑧ 吕思勉《拟编中国通史说略》，《中国通史提纲五种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，第402页。

⑨ 吕思勉《吕著中国通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2册，第10—11页。

住方位命名的“夷蛮戎狄”等少数部族^①。至于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融合，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^②，代表了“文化的重心”，各民族间的互融互通以同化为作用展开，其间又以文化为内在动力，同化的过程表现为“以文化的势力为前驱，以政治的势力为后盾”，政治顺着文化的方向自然、感化地进行，而非勉强地、压迫地进行，中国的民族国家的造成是以文化的势力陶冶、团结民族，而以政治的势力组织国家，以为之藩卫^③。从这一视角理解中华民族的发生，吕思勉强调中华民族的卓然立于世界的特殊性：“惟我中华，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。而其中之汉族，人口最多，开明最早，文化最高，自然为立国之主题，而为他族所仰望”。在各民族交往融合中，“汉族以文化根柢之深，不必借武力以自卫，而其民族性自不虞渐灭，用克兼容并苞，同仁一视；所吸合之民族愈众，斯国家之疆域愈恢”^④。吕著通史讲述汉民族同化其他民族，也表现出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历史叙事，中国在地理上自成为一个文化区域，以黄河、长江两流域为文化的中心，中国文化扩展的路径，即是“汉族恃其文化之高，把附近的民族，逐渐同化，而汉族的疆域，亦即随之拓展”^⑤。

就整个中华民族的对外关系而论，则关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往来互通。在世界还未到达大同之境、文化未能划一之前，世界各民族国家以文化为特征，而且有着明显差异。吕思勉引述英国思想家罗素的观点，提出中外文化的优点分别是“科学方法”及“合理的生活观念”，两者的不同在于：前者探寻事物的真相和法则，关注人和物的关系；后者讲求修齐治平之道，注重人与人的关系。为了复兴中华民族，应当对域外的科学文化抱持开放姿态，“尽管无条件接受西洋人的科学”；与此同时，为保障人在世界上生存的权利，又须具备相当的“民族自卫的武力”，即“他人要妨害我的生存时，我们自然也不能不迫而自卫”。中国文化过于注重人与人的关系，表现出“宽容”、“伟大”的特色，又因其忽视人和自然的关系，使得自然科学不发达，制驭自然的能力不强，“因其过于宽容，不注意于人为的侵害，所以武力衰退，有时要受异族的压迫”，因此，在和西洋文化接触过程中，需要谨慎对待的是：西洋文化习惯对付自然，制驭自然的能力极强，“有时对于人，亦视之如物，足以为自己发展的障碍的，亦不免当作物，把他来排除，所以其侵略性质亦颇甚”^⑥。

在民族文化、世界文化的一元或多元问题上，吕思勉认同多种文化并存于现实世界，其间有着共同的原理，文化的传播性质以及人类与生俱来的“求善之性”和“相爱之情”，使得世界各种文化交流互织、互有关系^⑦。各民族文化本身在或急或缓、一息不停变化，并且逐渐趋于共同，走向大同之路的“世界的文化”^⑧；然而未到达大同之境以前，“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为一体，通力合作，以共御外侮”，这也是民族国家形成的原理^⑨。基于上述认识，吕思勉主张，世界大同是未来社会的高远理想，“现在世界上各种特殊的文化，都是将来大同时代文化的源泉。我们要尽力于大同，要尽力于全世界，对于本族的文化，就不可不善自保守，发扬光大”；从当下最切近处入手，则“民族主义，在今日是值得提倡的，而且是必须提倡的。只要不过分限于偏狭”^⑩。这里所说“偏狭”的民族主义，是指自恃本民族是“世界上最优的民族”，以“强人从我”姿态甚至“武力强迫”，以侵略他民族而达成所谓“宣传文化的使命”^⑪。吕思勉以为，民族以文化为特征，文化的侵略引发民族危机，那么，“天下最可怕的，是文化侵略”，“独有文化的侵略，则使你自己忘掉自己。自己忘掉自己，这不就是灭亡么”^⑫？

抗战初期，一些国人被中华民族受到帝国主义外力侵袭现象蒙蔽，流露出民族衰老不可复振的悲观情绪。如宋念慈所言，近百年来我国由于缺乏以历史教育唤起民族意识的努力，一旦和西方文明接触，“国人昔

① 吕思勉《白话本国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册，第7、54页。

② 吕思勉《吕著中国通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2册，第244页。

③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，第221、244页。

④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，第12页。

⑤ 吕思勉《吕著中国通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2册，第265页。

⑥ 本段均引自：吕思勉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，第283、288页。

⑦ 吕思勉《吕著中国通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2册，第10页。

⑧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，第286页。

⑨ 吕思勉《吕著中国通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2册，第244页。

⑩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，第285页。

⑪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，第219页。

⑫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，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，第281页。

日自尊自信之心便急剧衰退,以致造成今日国难日深的局面”^①。《申报》刊发书评谓:“在我国现在提倡民族意识和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的时期,民族史之类的书是非常需要的。中国人必须明了中国民族的起源、演变、混合的成分,过去立国的光荣、文化的构成及现在的分布和生存状况,然后才能引起爱好我民族的心情,因之增加了求民族解放的决心和力量。”^②以冷峻论史见长的吕思勉,于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末章批评道,“近来有人,因中国一时的衰败……竟怀疑到中国民族的能力。甚而至于有人说:‘中国民族,已经衰老了,不可复振的了。’这真是妄自菲薄了”;进而赞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,“我民族居于此土之久。这一片土地,好一片适宜于发生高等文化的土地,我们利用它,已经好几千年;现在此种文化,正要发扬其光辉于世界;亦惟有我民族,最适宜于改进此文化,扩大此文化”;最后呼吁全体国民保持“民族的自信力”,“鼓起民族复兴的勇气”^③。吕著通史末章《革命途中的中国》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,“非努力打退侵略的恶势力,决无可以自存之理”,国人应对民族复兴抱有“一百二十分的自信心”^④。

四 民族“感情”和历史“理性”之间

“民族主义是国民活力的源泉,其发展的情形自然更值得追溯和检讨”。吕思勉立足本土历史文化脉络,以自西徂东的民族主义理论,引述伯尔拿《民族论》“外力逼迫之为民族的因素”说考察中国民族主义演变,指出,“民族是世界上早就存在着的,民族主义却必待近世才发达;这就可见得民族主义的发达有一个客观上必要的条件,那就是外力的压迫”^⑤,民族主义受异族压迫而起,“外力虽为外的条件,而实是民族构成重要的条件”^⑥,肯定外力在民族自觉意识发生、民族主义觉醒中的关键作用。他认为,中国自宋以后“因异族的压迫,而引起了全民族的觉醒,替民族主义,建立了一个深厚的根源”,民族主义由萌蘖而成长^⑦。1935年的《论民族主义之真际》以及五年后发表的《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》两篇文章,吕思勉集中讲述了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轨迹。他将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分为四个时期:上古至秦汉为第一期,此时代多民族杂居神州大地,中原汉族向四方扩展,“因文明程度的独高,并不虑异族的压迫”,所以民族意识亦很模糊,“民族主义植下了一个根基,但其发荣滋长,则还有待于后来”;第二期在五胡乱华,彼时汉族和“异族”冲突对立,矛盾虽染,未极深刻,民族主义已经萌芽生产;第三期为女真进占中原时代,“女真的歧视压迫,而汉族的民族主义遂于此时形成。民族主义鲜明的旗帜,莫过于尊王攘夷之论。……中国的民族主义实至宋而后形成”;第四期是近代西力东侵以后,西人东来与国人的隔阂颇深,“五胡乱华以来,中国屡受异族的压迫,民族主义渐次萌芽,而未得正当发展的途径,遂至激而横决”^⑧。

中国民族主义至近代达到一个高峰,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,中华民族遭遇外部强敌的轮番欺凌,“四夷交侵,国家民族,都有绝续存亡的关系,可谓危急极了”^⑨。吕思勉从民族的应对态度出发,提出五口通商以来是中华民族“受外力压迫的时代”,戊戌变法以至1930年代则为中华民族“受外力压迫而起反应的时代”^⑩。民族危亡时刻,先进分子以民族复兴为志业,疾呼在民族主义发达的时代,“中国当其冲,故今日而再不以民族主义提倡于吾国,则吾中国乃真亡矣”^⑪。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抗战的局势愈发急迫,日本的侵略将中华民族推向亡国灭种的险境。中国的民族主义因“外力之胁迫”,在谋求生存和独立的对外抗争中发展为最强劲的一股社会思潮。如顾颉刚所言,“强邻肆虐,国亡无日,遂不期而同集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”^⑫。彼时历史学

① 宋念慈《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论》,《浙江省中等教育研究会季刊》1936年第5期,第46页。

② 寄一《读〈中国民族史〉》,《申报》1937年8月5日,第14版。

③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,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,第288—289页。

④ 吕思勉《吕著中国通史》,《吕思勉全集》第2册,第380页。

⑤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》,《论学丛稿(下)》,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2册,第685、680页。

⑥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,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,第219页。

⑦ 吕思勉《吕著中国通史》,《吕思勉全集》第2册,第337页。

⑧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我见》,《论学丛稿(下)》,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2册,第680—683页。

⑨ 吕思勉《吕著中国通史》,《吕思勉全集》第2册,第50页。

⑩ 吕思勉《中国民族史》,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,第283页。

⑪ 蒋百里《民族主义论》,《蒋百里全集》第1卷,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,第35页。

⑫ 顾颉刚《〈禹贡〉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》,《史学史研究》1981年第1期,第66页。

者为了适应对日抗战的舆论斗争和民族解放事业,“或者从历史上民族斗争的光荣事迹来鼓励抗战的信心,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分子的警惕性”^①。在此情势下,“自度终不能为纯儒”的吕思勉,论学愈发讲求当世的实用,历史著述关怀民族、国家和现实社会。唯其特别之处在于,在民族的“感情”和历史的“理性”之间,吕氏仍坚守追求“真正的历史”本位。

吕思勉强调:“各种学问,皆须求得正确之事实,然后归纳之而得其公理,史学亦犹是也。”^②论学以求得真实为前提,历史研究尤其如此。1920年,为沈阳高师所作历史讲义,吕思勉以“科学的眼光”和“正确之事实”为治史要事,将求得史事的真实作为历史研究第一步,然后从正确的事实中“观众事之会通”,归纳寻求公例^③;同时期的《白话本国史》也将“科学的眼光”和“考据之学”看作治史的最紧要之处,尤其是由考据方法获取“正确的事实”^④。上述治学理念也真切反映于其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论断。在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序文中,吕思勉曾说,讲民族历史不能抹煞史实真相,讲民族问题不能隐讳以往的矛盾和冲突,应当“忠实叙述”汉族及各少数民族关系^⑤。以此,吕思勉批评传统史学以历史激励爱国、爱种族,存在“蔽于偏见,致失史事之真”的谬误以及“明知非史事之真,而故为矫诬”的愚民惑世^⑥。在爱国爱族的“感情”和历史研究的“理性”间,吕思勉一方面肯定“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、爱民族之心,亦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”,同时强调凡事总有一个适当限度,“用之太过亦有弊”,以历史为中介宣扬爱国主义、民族主义,须恪守“感情与理性,须相辅而行”原则,不能“昧于事实的真相”,偏重感情而抹杀理性,过度掺入民族主义情绪,过于拔高本族与贬抑他族,应当运用“真正的历史”克服由于“矫揉造作的历史”所产生的民族主义误用的弊病^⑦。吕思勉曾因《白话本国史》岳飞、秦桧的评价陷入诉讼案,有人指控吕著“诋毁岳飞,乃系危害民国”,而作者坚持治史求真未曾退却。晚年反思此事,他依然坚称,“欲言民族主义,欲言反抗侵略,不当重在崇拜战将。即欲表扬战将,亦当详考史事,求其真相,不当禁遏考证”^⑧。

事实上,上述吕思勉有关民族主义和史学关系的论述并不乏同道者。1935年,化名“疑”的作者,就批评“以历史学为民族主义的丫头”,将历史学作为工具鼓动民族复兴运动的“民族主义的历史学”,即“表扬过去民族历史的光荣,以鼓动民族复兴运动”,赞同“在国难严重的现在,我们应该尽量揭发中国历史的真相,使国人得以鉴往知来;必要的时候,为应用起见,固然也可以特提中国过去的真正光荣历史,使民族增加自信力”,然而历史学完全是讲求客观的学问,“我们需要一部客观的历史,做我们良好的镜子;我们不需要凹凸镜,使我们的影子模糊”^⑨。历史的研究自当以敬畏历史、尊重史实为前提,避免“凹凸镜”所显现的变形画面,由“平面镜”所得真实而客观的影像求得历史的真价值。

总之,作为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的术语,民族主义自然有其特别的指向和内涵。自民族主义传入国内,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,也影响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。新史学家吕思勉不仅承袭了中外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,而且还从中国历史情境中理解民族,探寻民族主义的思想因子及其演变脉络。他从“西来说”转向“中国本部论”认识汉民族起源,以文化为民族的根柢分析中华民族的特征,运用“同化论”、“外力压迫论”阐述中华民族和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生发展。其间,吕思勉不为民初知识界的时风所拘囿,在民族的“感情”和历史的“理性”之间,以“史事之真”立论民族历史和民族主义,以“真正的历史”克服民族主义误用之弊,表现出一个历史学者自立自得的气象。

[责任编辑:凌兴珍]

① 叶蟪生《抗战以来的历史学》,李孝迁编校《中国现代史学评论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,第282页。

② 吕思勉《整理旧籍之方法》,《论学丛稿(上)》,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1册,第293页。

③ 吕思勉《沈阳高师中国历史讲义绪论》,《论学丛稿(上)》,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1册,第204页。

④ 吕思勉《白话本国史》,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册,第5页。

⑤ 吕思勉《〈中国民族演进史〉序》,《中国民族演进史》,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5册,第213页。

⑥ 吕思勉《史籍与史学》,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8册,第20页。

⑦ 吕思勉《历史研究法》,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8册,第58—59页。

⑧ 吕思勉《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》,《论学丛稿(下)》,《吕思勉全集》第12册,第1229页。

⑨ 疑《论所谓“民族主义的历史学”》,《惠兴女中》1935年第3期,第3—4页。